

试论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形态 对北宋制夏的影响

杨 文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 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 重视利用河湟吐蕃及汉传民俗、宗教文化, 求得吐蕃民族对汉宋文化的认同, 平息和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 以期最终达到经制西夏的目标。

关键词: 河湟; 民俗; 宗教文化; 制夏

中图分类号: K244/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5681(2008)02- 0077- 04

A Trial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Custom and Religious Culture Morphology about Control of North Song Dynasty to Xixia Dynasty in Hehuang Area

YANG Wen

Abstract: Hehuang area is the important segment of the war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Xixia Dynasty and military system of North Song Dynasty. In the strategy of North Song Dynasty to Hehuang, North Song Dynasty set great store by making use of Hehuang Tu-fan and national custom that came from Chinese to try to get the okay with the culture of Chinese,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of nationality and attaining the aim that controlled Xixia Dynasty.

Key words: Hehuang; religious culture; national custom; controlling Xixia Dynasty

中国历史上聚居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部族, 由于其文化形态等方面与中原汉族存有差异, 因而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对这些民族或部族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也不同于中原汉族, 虽然这些地区属于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统治的范围, 但其又是强弱不等的自治实体, 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北宋时期, 突出的西北边防与民族问题, 推动了自治实体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北宋初对西北边区这些自治实体的大体统治方式是: “命之戎佚, 赐以官俸, 量其财力功绩, 世相承袭, ……自充本族巡检, 绥怀族帐, 谨固疆界, 器械糗粮无烦公上。”^[1]

北宋时河湟区域最大的自治政权实体是唃廝囉政权, 兴起于公元11世纪初, 是藏族历史上自吐蕃王朝灭亡后, 由吐蕃各部落建立的诸多地方政权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权, 是当时活动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蕃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

本文从北宋时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形态的角度探讨其对经制西夏的影响, 并就教于方家。

一 北宋时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的内容

(一) 吐蕃民俗及宗教文化

河湟区域唃廝囉民俗及宗教文化继承了吐蕃王朝的传统民俗及宗教文化,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其国大抵吐蕃遗俗也, 怀恩惠, 重财货, 无正期。市易用五谷、乳香、卤砂、麝毯、马牛以代钱帛。贵虎豹皮, 用缘饰衣裳。妇人衣锦, 服绯紫青绿。尊释氏。不知医药, 疾病招巫覡视之, 焚柴声鼓, 谓之‘逐鬼’。信咒诅, 或以决事, 讼有疑, 使诅之。讼者上辞牒, 籍之以帛, 事重则以锦。亦有鞭笞扭械诸狱具。人喜啖生物, 无蔬茹醢酱, 独知用盐为滋味, 而嗜酒与茶。居板屋, 富姓以毡为屋, 多并水为秋千戏。贡献谓之‘般次’, 自言不敢有贰则曰

收稿日期: 2007- 12- 01

作者简介: 杨文 (1966-), 男, 甘肃通渭人, 甘肃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系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专门史专业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心白向汉”云。^[12]这里明确记载了“巫觋看病,信诅咒”等苯教流传及传统民俗的情况,反映出当时浓厚的吐蕃传统民俗文化。

据藏族古文献资料记载,朗达玛灭佛时,在典卧日地方有三名僧人得知灭佛情况后,遂携带戒律、经书等逃亡阿里,后又辗转逃至河湟一带,传播佛法。在唃廝囉建青唐政权前,河湟吐蕃地区还没有建立起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僧人的活动仅限于民间和乡村寺院。僧人利用优越的地位,干政或参加军事活动。如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发生的河湟吐蕃与宋争夺古渭寨的三都谷战役,其领导者就是僧人的大首领李立遵,其他僧人也参加了这次战斗。^[13]随着僧人力量的增长,河湟吐蕃地区的佛教逐渐繁荣起来,“此时各派争立寺院,大有取各地独立王而代之的趋势。”^[14]吐蕃人“尊释氏”,^[15]在岷州的《广仁禅院碑》中就记载了吐蕃人的崇佛之俗,“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16]李远《青唐录》载:“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哥,水西平原,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楹。为大象,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阿里骨斂民作是像,民始离貳。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17]“尊佛重僧”正是吐蕃宗教文化的反映。

(二) 汉传民俗及宗教文化

在河湟区域,不仅居住着大量的吐蕃民族,还居住着大量的汉、党项、回鹘等民族,这种民族杂居相处的局面,为各种民俗及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

入宋以来,各民族之间通过贸易和屯垦加强了交流,“盖邈川与吐蕃部落杂处,又喀罗、嘉木卓等处日有博易,人情狎熟,易为传递语言。”^[18]汉藏官方、民间贸易大为兴盛,“熙宁三年,王韶置市易司于秦凤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于兰州。自后,于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务。”^[19]贸易往来促使商旅熟悉对方语言、风土、人情;同时在北宋时,周边各镇招募了很多以蕃部为主的蕃兵戍守与屯垦。如《宋史·兵志》载:“安石奏曰:今以三十万之众,渐推文法,当即变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余人,耕田百顷,坊三十余所。蕃部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其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其势易以调御。请令韶如诸路以钱借助收息,又捐百余万缗养马于蕃部,且什伍其人,奖励以武艺,使其人民富足,士马强盛,奋而使之,则所向有功。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20]汉蕃军士共同戍守与屯垦,增加了彼此习俗及宗教文化交流、学习的机会。汉族的民俗及宗教文化借此就大量传入到河湟区域。

如关公(关羽)崇拜在宋代已影响到了蕃部民

间,其成为全国性的宗教现象始于北宋中叶。在一些汉蕃杂居的区域如河湟区域,拜祭者中不乏蕃部同胞的身影,其神勇善战,忠义千秋的精神也必然受到蕃部同胞的崇拜。^[21]

汉地佛教于两宋之际向蕃部民间传播,北宋前期,汉地佛教在河湟区域就有很大的势力,作为主流信仰之一,影响非常深远。无论从蕃区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佛像造型或饰物,还是寺庙题名、僧侣服饰、法名和师号,都受到汉地佛教文化的重大影响。

吐蕃记事无正朔,言往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用十二辰纪年,也是汉传民俗文化影响的结果。

同时在蕃区佛教里也杂糅有大量的汉传医学和道教的内容,河湟吐蕃部落里没有学校教育设施,寺院是唯一传播文化知识的场所。虽然北宋熙宁五年,宋王朝曾在熙河地区官办蕃学,招收蕃部贵族子弟入校学习,一时在熙、河、洮等地出现新立蕃学;这些学校,教材来源于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标准教材,教师是精通儒学,又熟悉民族风情的汉族儒士;科举考试给蕃区以优待,增加熙河路各州的解额人数。熙宁六年诏:“熙河路举人不以户贯年限听取,应熙州以五人,洮、岷州各以三人为解额。”^[22]八年,河州“增解进士为五人额。”^[23]但到熙宁八年,北宋因边防财务紧张而解散了蕃学,宋神宗下诏说:“熙河路兵食吏奉日告缺,而蕃学之设冗费为甚,无补边计,可令罢之,其教授赴阙,蕃族子弟放逐便。”^[24]官办蕃学仅存三年就中途夭折,依然是寺院垄断教育的局面。由于北宋王朝对佛教文化的扶持,蕃僧往来内地频繁。受到汉地兴盛一时的道教影响,使蕃僧的符水消灾法及驱鬼召神等手段,都染上了道教神仙化的色彩。同时,也使他们有机会阅读汉地医学。如岷州《广仁禅院碑》载:“长道(今甘肃礼县)有僧曰海渊,居汉原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又有药病咒水之术,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25]可见,蕃地僧人受汉地道教符术影响,能以诅咒、符水驱鬼降妖;又以医术,为贫病的蕃民治病,受到当地民众的深深爱戴。^[26]在藏族苯教文献中记载:“自古苯教有两种。”即对祭祀山神者和星象家称“白苯”,以九宫八卦算命等五行卜算、预示吉凶者称“黑苯”。^[27]九宫八卦算命等五行卜算,明显受到汉地道教文化的影响。

二 北宋时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对经制西夏的影响

北宋时期,与中原王朝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河湟唃廝囉政权。据史料记载,宋代汉蕃关系,政治

上时战时和,军事上互有攻伐、杀掠。但在宗教文化上,尤其是民俗文化方面,从未中断过交流。这种交流没有因为某一政权的丧亡而中断,也没有因为民族的纷争而绝弃;只要是双方需要,交流就会互通有无,就会超越辖界,因共同利益而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北宋立国后,由于党项的崛起,宋王朝与党项的矛盾逐渐激化,对党项的战事,使宋倍感兵力不足。北宋政府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河湟区域的吐蕃民族,以期“以夷制夷”。宋咸平 998—1003年)初,李继先恢复祖先故土后,虽对宋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却寇钞不绝。这时北宋正忙于与辽在北方的争夺,因而在西北的兵力非常有限。为尽可能地遏制党项的进一步发展,确保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重镇的安全,一些北宋臣僚提出利用西北吐蕃民族的建议。“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诏诱远处大族首领,啖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18]同时宋廷下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继迁者,当受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19]到1038年元昊称帝,北宋边防更趋于恶化,从而使北宋对河湟吐蕃更加看重,恩威并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经营。

(一) 北宋时河湟区域民俗文化对经制西夏的影响

吐蕃民族勇悍善斗,“劲悍,使习险阻,利其田产,乐其家室,以战若守,一可当正兵之十,敌惮之。”^[20]吐蕃是一以战死为荣的民族。在唐代就虎啸西陲,威逼唐廷,拓土万里,“号英雄,为中国患最久。”^[21]入宋以来,大量分布在河湟区域的吐蕃部民皆其遗类,保留着崇尚勇武的优秀传统。“财气勇悍,”^[22]不惧战斗,“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23]“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24]不仅如此,还出于保家的主观愿望,一遇侵犯,则战斗力更强,范仲淹曾言:“熟户恋土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斗,可以藩蔽汉户。”^[25]正因为蕃部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因而成为宋夏极力拉拢的对象。如其归降西夏,则不仅会使“贼势转盛而边堠无复悍蔽”。^[26]“边人失其所恃”。^[27]而且使西夏入寇之时,“可以通行无碍”。^[28]反言之,如宋“抚驭之间,恩威所得,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29]北宋后期,不惜大动干戈,武力开拓河湟,也有这个理由和动机。

北宋统治者在西夏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马的重要性,而河湟蕃部的畜牧经济,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尤以培育、繁殖良种马享名天下,“青唐之马最良。”^[30]鉴于河湟蕃部食肉饮酪,所嗜唯茶,日不可缺的习俗,宋政府大力开展茶马贸易,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市茶,以茶易马。商人经营茶叶买卖,要到京师榷货务交茶钱,然后持榷货务给的“券”到指定的务、场提取,不得私自

购买。后因宋夏关系恶化,战事频繁,战场上需要的马匹越来越多,为保证马的供应,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经提举茶场李杞建议,将市茶与市马两个机构合二为一,茶马的经营权统一由朝廷掌握,并在缘边设置榷场。熙宁年间,先后在熙、河、岷州一带置场市易,召募汉蕃商人前往经营贸易,市营榷场由官府统一管理。交易产品应有尽有,但仍以茶马为主。宋支付吐蕃人马匹等商品价值的主要还是茶叶。史载从熙宁至元丰年间,每年运往熙河的茶叶为四万驮。^[31]买马岁不下一万五千匹,为诸路买卖之最。^[32]这不仅使茶马互市日趋繁荣,而且也给宋带来丰厚的利益。据载从元符到崇宁年间,宋在熙河市易司每年得茶科三百万缗,取得粮食足够十万军马吃三百日。^[33]北宋政权正是因为成功的运用了“嗜茶”这一吐蕃民俗,以“茶马”贸易为手段,联蕃制夏,最后达到巩固西北边防的目的。吐蕃通过茶马互市贸易,愿意接受宋王朝的领导,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而西夏也因与宋对峙,干戈不息,引起茶荒而导致人们的不满,迫使西夏与宋议和,以购进茶叶。

在宋代,河湟区域基本上以蕃族为主体,但还夹杂有大量其他民族,民族构成相对复杂。有些是吐蕃军队及随军部落,因吐蕃王朝崩溃,大部分无法返回故里,就留居在这里;与当地汉人、党项人等一起杂居,就地耕牧生息繁衍。而不少汉人又迁自内地,汉蕃杂居,共同生活,相互交往、通婚,联系紧密,在语言、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相互影响吸收,进而在心理素质方面逐步趋向一致。据所处环境,一部分汉族被同化为蕃族;而另一些地方的蕃族则又被融入汉族当中,民族观念趋于淡化。吐蕃民族正是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不断受到相对先进的汉文化熏陶,在文化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共同性;宋将内属的蕃人组成蕃军,录用蕃族首领,在编制上逐渐接近汉军,并于汉军一起防御边寨,参加制夏战争。

(二) 北宋时河湟区域宗教文化对制夏的影响

因吐蕃人民尊佛而尚白,故宋统治者利用这一宗教文化习俗,作为羁縻吐蕃首领的方式和划分赏赐等级的标准。宋统治者表彰青唐王子瞎征、陇拶等人归顺,划分赏赐等级时,就是以“瞎征、陇拶以忠顺、余外忠勇及心白为三等,仍等第赐以银袍带。”^[34]宋甚至在要害之地部署军事防守时,也要“令以心白向汉有力量首领住坐把守。”^[35]

由于吐蕃“尊释氏”,故宋“以蕃俗倣佛,故以佛事怀柔之。”借助宗教羁縻吐蕃人民,“乃敕数州皆建佛寺。”^[37]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熙州建“大威德禅院”,六年十月(1073年)河州建“广德禅院”,同年十一月熙州又新建“东山禅院”与“东湖禅院”,并赐名为“慈云”与“慧日”。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岷州又新建“广仁禅院”。数年之间,佛寺接踵而起,其目的就是想用“塔庙的威严”来改变

吐蕃民风,求得与宋的文化认同,求得经制西夏的效果。

因蕃僧的特殊身份及不可忽视的对蕃人的影响,北宋王朝也利用吐蕃“信重喇嘛”的习俗,借助蕃僧为其服务。乾兴元年(1022年)十一月,宗哥唵厮啰、李立遵遣蕃部嘉木磋沙卜哩,到泾原路部署司要求内附,宋朝持有戒心,于是“遣蕃僧一人及先附得谋者摩垒,与来使同入宗哥。”^[39]刺探虚实,以预为边备。一些吐蕃僧人因此而受到宋的嘉奖。北宋王朝也利用吐蕃重僧习俗,借助汉僧为其服务。熙宁中,王韶谋取青唐,“韶以董毡、摩正多与僧亲善,”^[39]而蕃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于是“不远千里请京都相国寺汉僧智缘随同王韶至边。智缘到蕃帐中,凭言辞说服吐蕃结吴叱腊归化。”^[40]俞龙珂、禹藏纳令支等部族相继皈依。《宋史》为僧智缘立传以褒其功,被称为“经略大师”。另一位为宋在河湟区域实行怀柔羁縻政策起了很大作用的僧人是海渊,他是岷州长道(今甘肃礼县)县人,曾主持修建广仁禅院,因爱民治病,道行高尚,深受当地人民爱戴,“既能信其众,又能必其成,复能知其终,必以示后皆非苟且者。”^[41]吐蕃僧人也时常充当使者,为蕃宋双方政权服务。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宗哥唵厮啰,李立遵遣蕃僧景遵等十人来贡。”^[42]皇佑五年(1053年)十二月,磨毡角遣进贡首领紫衣僧遵阌毡结通、沈遵、党遵叱腊青来宋朝进贡,受到宋朝的赐赏。^[43]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唵厮啰派蕃僧曹遵等携带蕃书送往秦凤路经略司。^[44]他们都利用其僧人的身份,在沟通汉蕃人民的感情与文化,增强吐蕃向宋皈依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重视利用河湟吐蕃及汉传民俗、宗教文化,求得吐蕃民族对汉宋文化的认同,平息和解决汉蕃民族之间的矛盾,以期最终达到制夏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卷18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2] [5] [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吐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二[M].台北:高拜石著作家出版社,2005.
- [4] [宋]张方平.乐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521.
- [6] [15] [36] [37] [41] [宋]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 [7] [宋]李远.青唐录,卷35,说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50.
- [8] [元]脱脱等.宋史,卷487[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 [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 [元]脱脱等.宋史,卷191,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 [16] 孙悟湖.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J].西藏研究,2006, (4).
-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1,熙宁八年二月戊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 燕松柏.本教类属初探[A]//四川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编印.地方史地文集[C].1989.
- [18]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0,边防门·上真宗论陕西事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
- [19] [元]脱脱等.宋史,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甲午[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8,熙宁五年九月壬申[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1]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 [2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二月丙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佑四年十月丙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癸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三月丁卯[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7] [2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9]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5,兵门·上仁宗乞令陕西主帅并带押蕃部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
- [30]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45,上钦宗论慧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
- [3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3] [元]脱脱等.宋史,程之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4] [42] [43] [4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199,蕃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癸丑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乾兴元年十一月甲戌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6,熙宁四年八月辛酉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0] [元]脱脱等.宋史,僧智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张科]

[责任校对 陈亚艳]